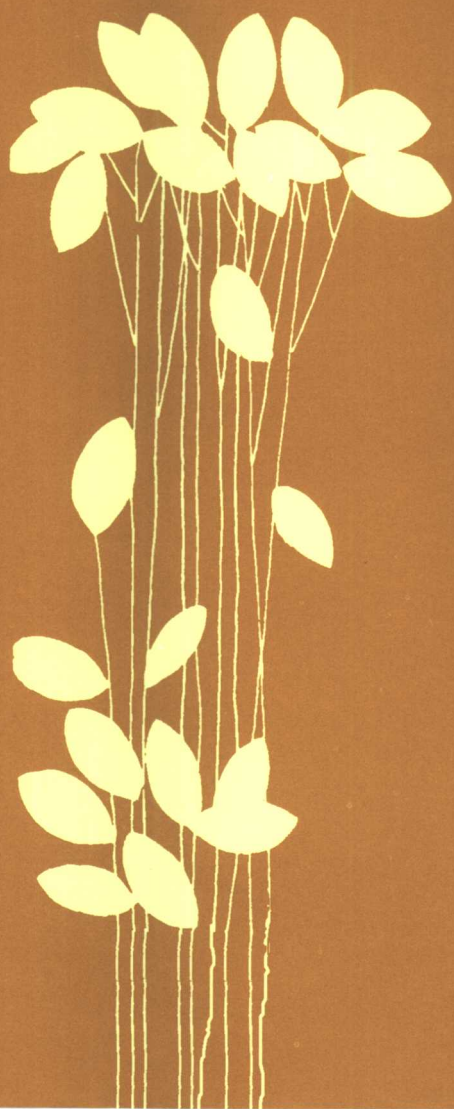


推窗集

鯤西◎著



学术随笔文丛

学术随笔文丛

推窗集

鯤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窗集/鲲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学术随笔文丛)

ISBN 7-5004-2547-3

I. 推… II. 鲲… III. 鲲西-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66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9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3.00 元

出版前言

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代都不乏硕学鸿儒，他们常常在精心编撰鸿篇巨制的同时，往往又举重若轻地写一些随想录或笔记式的短篇。鸿篇巨制固然能成为传之后世的不朽名作，随想录式的短篇同样会成为“千秋绝调”。学术文章不以长短论高下，古今皆然。明代学人袁中道曾谓：“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载？”可见，“高文大册”与“小文小说”，各有其价值和特色，其卓异者，皆谓中华学术之瑰宝。

我国当代的著名学者，大多继承了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于潜心研究撰写大部头专著的同时，也常有思想闪光与真知的发现，或在探研学术问题的深邃思考中，形成稍纵即逝的真理颗粒；或在对各种书籍的“序”、“跋”中，阐发个人对学术问题的独见；或在博览群书时，考释出对某人、某事、某书的真谛……这无疑都是学术研究中的宝贵结晶。对此，学者们也常率性命笔，以随想录的形式形诸文字。倘能将这些文字汇集成册，当能促进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给众多学人与广大读者以启迪。

近年来，在图书出版界出现了“散文热”，但多属文艺性散文，而学术随笔尚不多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以出版高层次学术

著作作为特色，根据我社的宗旨，特组编了《学术随笔文丛》（以下简称《文丛》），以繁荣图书出版。

《文丛》的特点，着意在“学术”与“随笔”上，即文章的内容须是学术性的，但并非长篇学术论文，而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形式，且具有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文风要清新、简练、洒脱、活泼，富有文采，但又非一般文艺性散文。它既区别于现时出版的学术论集，又不同于文艺散文创作。

《文丛》的内容，力求丰富多彩，涵盖面广，包括学术短论与考辨；读书札记及学术论著的“序”、“跋”、“评”；治学心得体会；学术人物的回忆与怀念；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师友往来书信；学坛掌故轶闻；……等等。

《文丛》的篇幅，每本大致在 20 万字左右，以免篇幅过大。这样既促作者慎重选文，以保证该书的质量和特色，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并减轻购书时的负担。

《文丛》各集所收文稿，以散见于报刊上发表过，既有价值而读者又难寻觅，以及未曾发表过的文稿为主。对已结集出版过的文章，尽可能不选。此乃针对时下某些结集出版过的同类读物，同一作者相同的文章，刚编入此书，旋又编入彼书，读者对此已深为不满，《文丛》将尽量避免这种重复出版的现象。

1996 年，我社推出了《文丛》第一辑，共有 11 位著名学者的 11 种学术随笔力作；此次推出的《文丛》第二辑又收有 10 位著名学者的 10 种学术随笔新著。愿此举对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积累，都能有所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5 月

序

推窗集书名借自清袁枚题为《推窗》的诗，诗见《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连宵风雨恶，蓬户不轻开。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诗是平常的，好在三、四句有情致。风雨恶也只是足不能出户，心情愁闷而已。推窗见山始觉自然仿佛与人也有情感上的联系，这是这首诗写得好的地方。1957年初，我曾因公去杭州小憩，此游是数十年来难忘的一次。旅游期毕回到上海，恰好碰上那年最大的一场台风。风雨交加，高楼门窗本极坚固，也似有被震撼的感觉。是日未能去工作，等到次日去时便投入整风鸣放，并随即转入反右斗争。越年对于我来说更像是触雷一般猛跌在地，以此留滞在外者几十寒暑。记得先时曾给一位长辈去信说因心情至恶不能去看她，谁知这一阻隔竟是如此之长的悠悠岁月。

70年代后期回来再理旧业，现在收入这本集中和已刊的《三月书窗》就是这二十年左右写的小文。前人有这样一句诗：“残年况味已参透”，在我这晚近的二十年是幸而得的自己耕耘的岁月，今天的心情恰似袁子才写的“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大风早已过去，暮年是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残年的况味究应如何参透，我好像未暇思索或可说是平淡地对待的。这些文章皆平日有所思有感触而后写成的，也有是读了他人的书产生的随想。如果能由此带给读者一点共鸣，在我就像推窗望见岚气已消，远方的山峦显现在晴朗的天空之下，这是自然赐与的喜悦，也是本集名“推窗”的原由。

为便于读者翻检，现将集中文字分成七个小组：（一）清华园感旧余篇，（二）思想与评论，（三）近世翻译与新文学文坛，（四）小说谈藪，（五）明清易代与乾隆盛世两文士，（六）音乐与我，（七）集外余文。有几组文字需要说明一下。80年代中我参加上海红学会并负责编该会的《红楼梦研究集刊》，时间约二三年，在这期间我自己也写了约十来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此外还有有关明清诗文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没有编成集。这次只把论文中比较有些见解可以独立成篇的作为短文收入。论文难写，写不好就会显示出一种架式，这是我所不喜欢的。第六组音乐与我的撰写也有一个经过。大约两年前北京《读书》编辑赵丽雅女士过沪，她知道我喜欢音乐，因说何不为上海《音乐爱好者》杂志写些，她遂将这意思告诉该刊主编李章先生。不久李先生来电话，可是我总迟迟没有写。又一次李先生再来电话，我适因食物不慎咯血，他非常体贴，没有坚持让我交稿。后来我终于写了第一篇，《音乐爱好者》是双月刊，一年多下来共写出七篇。诚然音乐是我所爱的，年轻时听音乐那种激情是不能忘记的。人老以后趣味会有变化，同时衰老也带来不利因素，即不能如年轻时那样专注，而听音乐需要的是非常专注的精神。现在这些小文大多来自我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听音乐时所获得的激情是不能再现的，它的珍异就在于只给你一次启示。记忆会贮存一些影像，这样就有了评论音乐的文字，有了历代用诗文描写聆听音乐的文学作品。但愿这些谈音乐的小文在偶然被读者看到时，如果真的能触发他进入音乐这个殿堂，那就像无意间撒下的种子而结了果实。

集中大部分文字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先是陆灏君，后来是刘绪源君，两位青年朋友都有书癖，因此晤谈常有乐趣。书是要靠人传播的，朋友之间相互交换的信息尤其重要。有因朋友影响我而使我读到我不曾知道的极好的书，也有我影响朋友的时候。纪德每日清晨必读一遍美国爱默生写有关自我信赖一节文字，这

是说读书是个人的事，是一个人独自的冥思默想。不过若要创造些什么，孤独是不行的，他需要朋友的激励和理解。我记得伟大的歌德曾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读书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可是当有所领会时，其间所得的快乐常是能和朋友共享的。

读书决不是万能的事，古人早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导。有人在热情赞颂书时，把书神异化了，这是我不敢同意的。即使是精神上的事情，只要陷于过分的沉溺都是无益的。因此在对待知识和书这样的问题上，我还是欣赏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苏格拉底胸怀坦荡地承认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是沧海一粟。归根到底更重要的是人应求知。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探索就是善。”（马家驹、贺霖译文）

所以，人应当知道他自己的限度，正如人类应学会正确对待自然一样。

这本集子的出版，多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先生的协助和冯广裕先生热诚为之审订，谨在此致谢。

鲲 西

1998.9.6

目 录

序.....	(1)
--------	-----

清华园感旧余篇

不是怀旧的回忆.....	(1)
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	(6)
陈岱孙：一代学人的终结	(10)
增订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琐言	(12)
读俞平老《鹧鸪天》余感	(16)
读俞平老《乐知儿语说〈红楼〉》	(19)

思想与评论

理解辜鸿铭	(25)
林琴南与西子湖畔	(31)
盟鸥榭与小说《函髻记》	(34)
莎士比亚门外谈屑	(48)
重温左拉	(53)
小说是一种艺术	(55)
与张恨水邂逅	(58)

近世翻译与 新文学文坛

- 晚清翻译界及新文学时期的外国文学介绍 (61)
三十年代上海文坛袁中郎热 (77)

小说谈薈

- 《金瓶梅》作者一说 (81)
中国文学为何缺少悲剧传统 (88)
《红楼梦》论“情情”、“情不情”、“情极之毒” (93)
《红楼梦》沿袭《会真记》与《牡丹亭》 (97)
曹雪芹善写时光流逝 (102)
自传乎，虚构乎 (109)
曹雪芹用小故事增补情节 (113)
妙玉与倪云林 (122)

明清易代与乾隆 盛世两文士

- 吴梅村出山之谜 (127)
汪中为黄祖翻案，引祢衡为知己 (130)
汪中晚年讳言吊秦淮名妓马守真 (133)
汪中：默默的独行者 (135)
陈端生及其《再生缘》 (137)

音乐与我

引子·····	(150)
听音乐和看听音乐的人·····	(153)
音乐与音乐批评·····	(157)
音乐的“懂”与“不懂”·····	(160)
音乐洋洋乎盈耳哉·····	(163)
记忆·····	(166)
音乐碎语·····	(169)

集外余文

忆《中学生》·····	(173)
旧藏《韩熙载夜宴图》明摹本叙记·····	(177)
还书记·····	(179)

清华园感旧余篇

不是怀旧的回忆

1935 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已经过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这是人们不会忘记的伟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像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后人能理性地认识，却难感受到事件发生的当时的气氛。“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参加者、目击者，是 30 年代的一批青年，如今存者复有几人，时光的流逝会使他们不久就消失殆尽了。我没有读到当时人留下多少纪实性的回忆文。历史在这里仿佛缺少点能让后人捕捉的真实感。事实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并未停止对中国蓄意的有步骤的侵略意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方无休止的要求。在北方是华北特殊化，在南方是制造驻南京总领事失踪和上海天皇拉黄包车事件。这时你如生活在北方或者是在北平读书，你将感受到江南人尚没有尝到的屈辱感。这是我在当年亲见亲闻的：丰台车站加上日文站名，星期日日本官兵趾高气扬地坐胶车上北海公园，杜少陵诗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这正是当日的北平。你不知道这是在自己的国度，还是已经亡了国。正是这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懑，才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点。对于那一天上街的人和目击者，“一二·九”的标志就是公开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向世人显示中国的不可侮，中国未丧

失民族正气。所以历史是事实，但历史也包涵着热情。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比邻天涯》（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刊）是 30 年代一个有热血的青年写的怀旧文集。它的作者张宗植这时期在清华读书，并且是清华园早期地下党之一。我承刘安义学长寄赠一册。二次大战结束后，著者再去日本，在那里定居有了一番事业，以后归化日籍。虽然这样，也就是说他和学生时代的身份已有不同，但他在晚年写这些文章时依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回忆当年与他抱相同理想的一些友人，并且他还是以自豪的心珍视曾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叙述他怎样走上追求理想的道路的过程，也与同时代青年留下了相同的足迹。作者说：“我自己来说，辩证法的唯物论实在为我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见页 37）他读蒲力汗诺夫的《史的唯物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等等，极有意思的是我在青年时代也曾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著者说这些书好像使他吃得饱的东西，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

这本集子有两篇文章，一是《竹骡记》，另一是《永远的青年·恒久的交情》，记的是两位在清华时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这两人也非泛泛之辈，是与近代青年运动极有关系的人物，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作者自己 1935 年离开清华，这里是作者写他对友情的回忆，也就是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尚健在的人）早期在清华开展地下活动的情形。这是些珍贵的资料，不加注意就会在历史中湮没。“一二·九”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青年思潮的一个分界线。这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友人是代表“一二·九”之前追求真理的一批青年，他们的特点是通过书本寻找真理，对于未来相对地说是抱着朦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一二·九”之后迅速扩大的进步青年群，用历史的词语说是更加切入于现实的战斗中。他们不像他们前辈一样读蒲列汗诺夫之类的书才开始觉醒，反之，“一二·九”之后席卷于学府的是激进思潮，一本《大众哲

学》就解决了所谓人生观问题，他们无暇读蒲列汗诺夫。《比邻天涯》作者带着浓情密意的怀旧情结让我们从他的记述中看到的不仅是清华园一角，而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历史事长远的不说，近百年来中国青年从来就不是处在只抱书本而不问世事的时候。“五四”的未竟绪余到30年代又以另一种形态出现，30年代通过“一二·九”，青年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不可估量了。这是《比邻天涯》引起的我的思考。

30年代的旧北平一度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用著者的话说这是国民党实行的一种清道迎敌的政策（见页50）。先是1934年冯芝生先生游欧假道苏联返国，以后做了几次演讲说到苏联，我不记得当时冯先生讲演的内容，但知道30年代在西方（英法等国）也有一些文化界的名人和作家对苏联正在进行的试验抱着一种希望，料冯先生的讲话不会太过极端，但却被国民党的鹰犬所嗅到，因而有冯先生被突然绑架的事，地点似在河北省保定，消息传出学界为之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在舆论压力下冯先生才被释放。当时主其事的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换言之党部实际上是扮演特务的角色。侦骑四出，任意抓人，就像明代天启年间的厂卫一样。到次年（1935）1月的一个寒冷的黎明，军警特务进入清华园抓走一批学生，其中有柳亚子的女公子。这本书作者也在被捕之列，并且只有他和另一人被解送南京。这是1935年发生的事，作者说：“我和北平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这一告别要到四十五年后的1980年才和北平再见。”（见页53）清华园下一次被入侵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1936年的2月，宋哲元派兵包围校园，搜捕抗日救国的学生。军警是在晚上进入，黑名单上有名字的都躲到教授的住宅。据我的回忆这一晚并没有恐怖的感觉。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二·九”之后进步学生的队伍迅速扩大，大规模的军警包围尚没有上年少数特务进入校园抓人那么恐怖，宋哲元是奉南京命令这么做的，这时南京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已相对削弱，再就

是宋的所部纪律还是严明的。因此总括起来说“一二·九”是近代学生思潮的一个分界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青年学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宋哲元部队的入侵并未扰乱学生读书的清梦，而是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这个水木清华和它四周的物质环境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因为据说那些进入校园的士兵看到校内到处的现代化设施（新建体育馆的光滑地板、卫生设备等等）目瞪口呆见所未见。曾有位激进的批评家在评论曹禺文中说清华和城内的协和医院是两个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方，言虽过激但有部分道理。后来在潘仲昂光旦师的《图南日记》中看到写清华园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撤退前后记事，中间云至后数日四处宵小细民已在窥伺欲行洗劫了。清华的许多工役都是附近村落老百姓，一向关系良好，可是到了非常的时刻，贫富的悬殊会发生越轨行为就不足怪了。绝不能责备村民，美好的清华园原是建筑在象牙塔里，它的物质一向是和全国水平不相称的。所以有些思想进步者后来奔向圣地，看到北方妇女不堪入目的生活环境，反使她眷恋起昔日校园中那种优裕的生活，这是对于有着如本书作者所说的清华情结的怀旧者莫大的讽刺。但这还只是物质上的差距，具有更深层意义的是文化和知识上的差距。

对于这后一种差距，作者不讳言当年与他抱相同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知识的差距意味着见解上发生分歧。这对于投身革命的人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作者举了两个这样的例子（详见页 58、62、84）。但他委婉地解释说：“潮流中的个人，原是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哪怕不是路线方向上的问题，路上的一块石卵有时也会使行人颠蹶。”（见页 58）这实质上是旧的士大夫、读书人和现代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个归属的问题，历史真是可悲地重复着，读书人永远需要有所依附，明清之际那许多有才华的人，他们的蹉跎难道全都是自取的吗（请看

一看陈名夏、陈之遴这些人的事迹)，20 世纪今天的人曾怀着玉洁冰清的心，做出了贡献或者牺牲，又何尝不曾经历着荣辱浮沉这样的尘秽过程，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依附的那一方的力量，《比邻天涯》的追记比他人的怀旧文章好就好在透露了一些为别人所忽略了的问题。今天人们在评述近代学生思潮时追溯到清末民初（譬如北大之前的京师大学堂），这是太过于遥远了，眼看着 30 年代的一辈青年才是和当代思潮密切关联的，这是生于忧患而又目睹和参与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而且也更是世界历史大事二次大战和珍珠港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说与其只是恋恋于怀旧情结不如多做些历史的思考，30 年代的青年是值得我们的史家探讨的课题。对于有着清华情结与我一辈的人，我也向他们推荐这部《比邻天涯》。

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

40年代的昆明，出现了一批写新诗的青年，他们大都是西南联大的在校学生。战争使四面八方的学子聚集到一处，战争又使中国的新诗在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些热烈的爱诗和写诗的年轻人，并不属于任何诗的流派，他们从不同的途径从事诗的写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成为诗人都与学院传授的外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新文学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像这次这样外国文学的传授对创作产生如此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30年代中，艾略特的《荒原》曾被翻译（赵萝蕤）和介绍到中国，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战火烽起，如今在这西南城市，新诗突然大放异彩，学院传授外国诗歌和戏剧虽然由来已久，但艾略特《荒原》的中译本的出版，却更像是早早被撒下的一粒种子。

时光流逝，当年的青年诗人，不知几经沧桑和人世的纷纭，现在终于有了一本代表他们诗作的选集《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出版（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它的编者之一杜运燮也是当年的诗人。这是一部诗选，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它是一本历史记录。40年代距今未甚遥远，西南联大这个战时最有名的学府对于人们也不是太陌生，但时光永远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世故老人，你若不与相识，就会失之交臂。

《诗钞》分教师卷和学生卷两大部分。教师卷中有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还有一位来华讲学的英国诗人燕卜苏。闻一多先